

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中国濒危语言 个案研究

● 戴庆厦 主编

ZHONGGUO BINWEI YUYAN  
GEAN YANJIU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

● 戴庆厦 主编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戴庆厦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11

ISBN 7-105-06680-6

I. 中… II. 戴… III. 语言融合-对比研究-中国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900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5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38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三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主 编 戴庆厦

著 者 (按姓氏音序排列)

戴庆厦 邓佑玲 关辛秋  
何俊芳 何日莫奇 黄 行  
季永海 田 静 王朝晖  
张海琳 周国炎

作者与三家子村两位会说满语的老人（左二、右二）合影。



作者在街津口村赫哲族家庭调查赫哲语的濒危状态。左一、二为赫哲族。



保留土家语的保靖县仙仁乡龙头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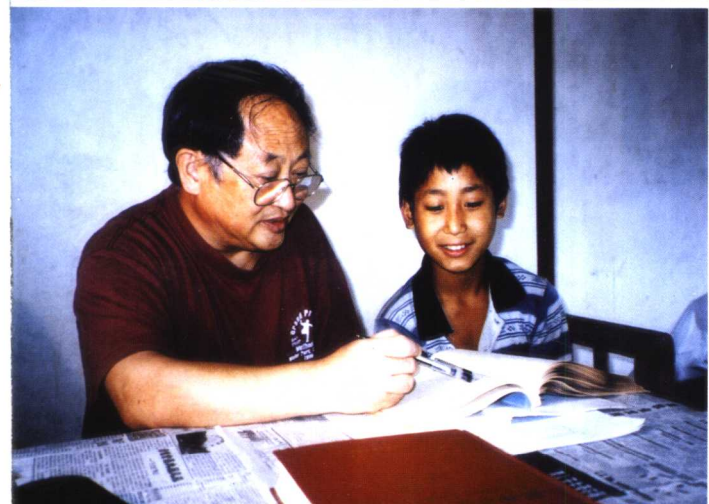




作者记录龙头村土家族在路边休息时用土家语交谈的情况。



2002年8月,作者在中缅边界山寨调查濒危语言——仙岛语。左一为尚会说仙岛语的仙岛人,左二为翻译。



测试仙岛儿童的语言能力。

作者在湖南省永顺县双凤村做田野调查。图中左一田氏老人尚能说土家语，并能用土家语演唱山歌。老人的孙辈已不会土家语。(老茂 摄)



2000年作者在贵州省普定县白岩乡新寨调查濒危语言——仡佬语。照片中的老人是该村目前仅存的少数仡佬语使用者之一，但日常交际语言已转用汉语。



2000年作者在贵州省贞丰县坡帽村调查濒危语言——仡佬语。照片中的发音人罗兴才除精通仡佬语以外，还兼通汉语和布依语。



目 录

一	论濒危语言·····	(1)
	——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所见	
二	仙仁土家语濒危现象个案研究·····	(24)
三	土家语是一种濒危语言·····	(252)
四	仙岛语濒危趋势个案研究·····	(358)
五	仡佬语濒危现象个案研究·····	(400)
六	街津口乡赫哲语濒危状态个案研究·····	(447)
七	赫哲语濒危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480)
八	满语文衰落的历程·····	(492)
九	三家子村满语使用情况个案调查·····	(535)
十	濒危语言的结构缺失和替换·····	(556)
后	记·····	(577)



## 一 论濒危语言

### ——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所见

#### (一) 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演变包括语言功能演变和语言结构演变两个方面。语言功能指语言交际能力的强弱，使用范围的大小；语言结构指语音、语法、词汇等语言要素的状态。语言功能的演变存在两个相反的流向：一是语言功能扩大，指的是语言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作用越来越大，使用的人越来越多，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是语言功能缩小，指的是语言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作用越来越小，使用的人越来越少，使用的范围越来越窄。语言功能缩小到极限，就出现了语言濒危。等到使用的人没有了，这个语言也就消亡了。所以说，语言濒危的实质是语言功能的衰退。

语言濒危、语言消亡自古有之，而且出现在世界各地。古代中国，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语言，如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语言先后都消亡了。在国外，也有众多的语言消亡了，如梵语、巴利语、哥特语、高卢语、赫梯语等。现存的历史文献能够证明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尤其是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流通的扩大、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语言濒危问题突出了。许多使用人口少、功能弱的语言有被强势语言所代替的趋势。有的语言学家估计，世界上现有的六千多种语言中有三分之二的语言将在 21

世纪消亡。这虽然只是一种可能的估计，但能够说明现代社会的众多语言已面临着濒危的威胁，濒危语言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由于语言濒危涉及多元文化的保留、人文生态的平衡、现代化环境下的语言演变趋势等重大问题，因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已受到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的极大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十分关注，把 1993 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世界各国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研究如何对待濒危语言问题。如：1995 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濒危语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1996 年在西班牙召开语言政策国际会议，讨论语言濒危问题；2001 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关于濒危语言问题专家会议”。国际上还成立了上百个抢救濒危语言的组织和基金会，如日本建立了环太平洋地区抢救濒危语言的组织和基金会。抢救濒危语言已成为全球的一个热门话题。

濒危语言研究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在理论上，研究濒危语言有助于认识人类语言的演变规律，特别是语言功能变化的规律。在应用上，濒危语言研究有助于正确对待语言使用问题，有助于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制定。在我国，语言濒危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有一些语言仍在延续过去已经出现的语言功能衰退的趋势，处于濒危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有些语言在使用功能上有所下降，语言转用现象有所增加，甚至出现濒危的趋势。这已引起一些少数民族的忧虑。研究濒危语言，对解决语言功能衰退的民族如何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如何开展语文教育、如何保存和继承民族文化等，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要正确认识、处理濒危语言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濒危语言性

质、特点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濒危语言的科学认识包括：什么是濒危语言，如何界定濒危语言，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是什么；濒危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制约语言濒危的因素是什么，其中主要因素是什么；濒危语言演变经历了什么过程，有哪些规律；濒危语言在本体上呈现出什么状态，与非濒危语言的语言状态有什么不同；等等。回顾过去，国内外虽一再呼吁重视濒危语言问题，但总的看来，对濒危语言的具体研究是很不够的，落后于对濒危语言的重视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语言学家虽然已调查、研究了一些濒危语言，出版过一些论著，但真正是从语言濒危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濒危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的较少，特别是系统、深入的个案调查报告、研究成果实不多见。何况世界的濒危语言又是如此之多，内容又是如此丰富，情况又是如此复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对濒危语言的研究，目前只能说还只处于初创或起步的阶段，现有的认识是很有限的，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在等待我们去探索。基于这种条件，目前要对濒危语言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概括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做了，也不可能很到位。

我们认为，濒危语言的研究当前应把重点放在个案的共时描写、分析上，对濒危语言进行微观的调查研究，逐步积累起丰富、确切的语料。这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基础性工程。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作好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掌握各种类型的语料，对濒危语言的认识就会有新的飞越，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理论概括。个案研究在内容上既要对语言功能进行分析研究，又要对语言结构进行描写，二者缺一不可。因为，语言功能的衰退，必定在语言结构上有所反映。要广泛研究影响制约语言濒危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因素，并从中分清主次，还要认识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此外，还要研究濒危语言所涉及的语言关系，从语言关系中认识濒危语言的地位。计量分析在濒危语言的研究中必须

重视，在对语言事实进行描写以及类型的分类时，要有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并从中归纳濒危语言的演变规律。

## (二) 如何界定濒危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才算是濒危语言？这涉及对某一语言是不是濒危语言的定性问题。对某一语言是不是濒危语言，不能轻率判定，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把不是濒危语言当做濒危语言，或把真正是濒危的语言漏掉，就不能认清濒危语言的本质属性。这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有害的。过去，有的学者曾把某一语言算做濒危语言，但说这种语言的人看了后很不高兴，并说：“我们这种语言说的人虽然少，但大家都在说，怎能是濒危语言？”

中国的濒危语言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有二十多种，有的认为有十多种，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所用的标准不一，此外还与对濒危语言的情况未能掌握好有关。关于界定濒危语言的标准，过去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有两种：一种主张以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作为判断濒危语言的依据。但具体到多少人口才算是濒危语言，意见也还不同。有的认为不超过1万人，有的认为在5万人以下。另一种主张是以掌握母语的年龄段为标准，认为40岁以下的人若已不掌握或虽懂一点但已不使用的语言是濒危语言。这些看法，虽各自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若只用单项标准，则难以准确界定，在落实到具体语言时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地处独龙江两岸的独龙族，虽然人口只有7426人（2000年），但男女老少都会说独龙语，没有一点濒危的迹象。阿昌语的使用人口是3万余人，现仍为阿昌族大部分人所使用，特别是说陇川方言的阿昌族，大都会自己的语言，很少有转用别的语言的。还有，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的浪速、波拉、勒期等语言，目前仍稳定地在使用，并不濒

危。可见,只依静态的人口标准是难以划清濒危语言的界线的。

经过个案调查材料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应当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因为濒危语言现象纷繁复杂,在使用人口、使用范围、使用功能等方面都会有所反映,所以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标,只依某一单项指标,则难以断定一种语言是不是面临濒危。

什么是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交际的,都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因此,综合指标体系应该是指与语言功能相关的诸种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这当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是最重要的。使用人口少,固然是许多濒危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使用人口少的语言,不一定非是濒危语言不可。语言使用功能急剧下降、使用范围骤然缩小的语言,当它已退缩成少数人使用的交际工具时,可以认为它已面临濒危。由此可说,界定濒危语言不能只依据静态的事实理据,还应看语言功能的动态演变。动态是事物演变的趋势和走向,是依事物的内在特点在演变的,所以往往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综合指标体系可分为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两类。核心指标是起主要作用的。主要有三:一是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比例。如果这个民族80%以上的人都已转用第二语言,并有增长趋势,其母语有可能是濒危语言。二是母语使用者年龄段的分布比例。如果这个语言只有中老年人懂得,青少年一代已失传,这种断代特征表明它已具有濒危的先兆。三是母语能力的大小。母语能力的衰退在听和说上有差异,一般是说的能力比听的能力衰退快。如果对母语只有听的能力而没有说的能力,或说的能力很低,说明这个语言的功能已严重衰退,正在走向濒危。参考指标是起补充、印证作用的,包括母语的使用范围、对母语的言态度,以及与语言使用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综合指标体系具

有普遍性和适应性，运用到具体语言时在指标的选择或对号上会有不同。根据以上设置的多项综合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土家、畲、赫哲、仡佬、满等语言应界定为濒危语言。以土家语为例：土家族母语使用者的人数只占土家族总人口的 1.78%，而 98% 以上的人已丧失了母语能力，应看成是濒危语言。

### （三）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与人、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随着濒危语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复杂性不断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看到，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语言外部的因素，如使用人口少、分布杂居、族群分化、民族融合、社会转型等，又有语言本身的因素，如语言表达和语言功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没有书面文字等。此外还有语言态度方面的，如本族对自己的母语消亡的态度。但往往不是由一个孤立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诸多因素中，必然存在主次之分，其中会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它在濒危趋势中起主导的作用。不同的濒危语言，由于社会历史各不相同，语言特点又有所差异，因而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也不会相同。

以赫哲语为例：赫哲族是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最少的一个少数民族，只有 4254 人（1990）。自 20 世纪 30 年代特别是 50 年代以来，由于受到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赫哲语使用人口大幅度下降，社会交际功能不断弱化，到目前已进入濒危状态。据 2002 年 10 月的统计材料，赫哲族主要聚居区的街津口乡，会赫哲语的人仅占 2.14%，绝大部分都已转用了汉语。造成赫哲语濒危的因素有：人口少，居住分散；渔猎经济，流动性大；族际婚姻比例大；近代汉语文教育全面实施等。但在这些因素中，人口少是导致赫哲语濒危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多由此而发。由于人口少，不能不实行族际婚姻，大量的家庭成为不同

民族混合的家庭，使保存母语的温厚土壤发生质变；由于人口少，没有可能产生本民族文字，只能实施汉语文教育。

导致仙岛语濒危的因素有：族群分化，人口少，社会发展滞后，社会转型，语言接触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族群分化。仙岛人是分布在云南省盈江县中缅边界的一个人群，使用属于藏缅语族的仙岛语。他们原先与阿昌族是一个族群，后来在迁移过程中分离了，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居住在偏僻的深山老林里。本来人口就不多，后来又发生传染病（天花），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据2002年12月统计，仙岛人只有76人，分布在芒俄寨和芒缅村两地。据老年人回忆，20世纪50年代以前仙岛人的人口比现在多，还坚持使用自己的母语，没有出现语言转用，但兼语现象已经出现。但5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语言兼用、语言转用的现象不断增多。目前，居住在芒俄寨的大部分人已失去母语，转用了汉语；而居住在芒缅村的仙岛人，虽还普遍使用仙岛语，但已普遍兼用景颇语、汉语，大多是双语人，青少年中有的已转用景颇语。总的看来，仙岛语已处于濒危状态，有被汉语、景颇语取代的趋势。族群分化，使得仙岛语只在人数过少的人群中使用，语言使用功能不能不下降，语言的丰富发展也受到限制。这是造成仙岛语濒危的主要因素。

又以土家语为例：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湖南、湖北、四川诸省，人口8028133人。土家语也面临濒危，目前会土家语的还不到总人口的3%。即便是保留土家语较好的地区，如保靖县仙仁乡，不会土家语的人也已占一半以上。还有15%的人虽会一些，但不大使用，只有30%的人还用土家语，但这些人均是兼通汉语的双语人。致使土家语濒危的因素有：长期受到汉族的影响，全面接受汉语、汉文化教育；在分布上与汉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局面，长期处于周围汉族地区对土家族地区的包围之中；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经济转型；民族意识不强，母语

观念淡薄等。这些因素导致了土家族语言选择的改变。但在上述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长期受到汉族的影响并接受汉语、汉文化教育。

满语也已接近消亡。满族 10682262 人中，大部分都已转用汉语，只有居住在黑龙江省爱辉县和富裕县的少数满族还不同程度地会说满语。满语走向消亡，虽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但起主要作用的应该是分布的变化，即满族从过去的相对聚居变为后来的杂居。顺治元年（1646 年）清军入关，大批满族人进入内地，分散在汉族的居住地，与汉族生活在一起。加上满族贵族顺应历史潮流，大力提倡学习汉语文，因而在文化、语言上不能不受汉族的强烈影响，使满族转用了汉语文。满语的衰亡大约经历了三百年之久。

研究制约语言濒危的因素，必须在广泛、仔细地分析各个濒危语言已经产生的各种现象，并经过科学对比，提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

#### （四）怎样从语言结构特点上认识濒危语言的特点

语言濒危的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研究制约语言濒危的外来因素，如分析社会历史、经济形态、科学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对语言濒危走向的制约。二是研究濒危语言在使用功能以及自身结构变化的特点。濒危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具体语言在不同场合、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等方面产生的差异，并从差异的综合研究中获取总体估量的信息，从中窥见濒危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一种语言进入濒危状态，其自身结构的特点会发生变化，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大小如何，不同的语言或同一语言不同阶段的情况往往不同。这也是濒危语言研究的一方面内容。回顾以往对濒危语言的研究，我们看到研究



者对制约语言濒危的外来因素以及使用功能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对后者的研究较少。下面，我根据自己实地调查的语料，谈谈仙仁土家语（以下称仙仁话）处于濒危过程中在语言结构上的一些变化。

仙仁话的濒危，在语言结构上的变化是受汉语大面积的影响。汉语对仙仁话的影响，在词汇上反映最强烈、最突出。随着汉语的普及，汉语借词已大批进入土家语，而且有不少已进入词汇系统的核心领域。如下列一些核心词，与土家语有亲属关系的非濒危语言都牢固地使用本语词，而仙仁话则转用了汉语借词。例如：zē<sup>33</sup> liā<sup>35</sup> 月亮，təhi<sup>35</sup> 气，khu<sup>55</sup> tā<sup>33</sup> 胆，tie<sup>55</sup> tie<sup>33</sup> 父亲，lō<sup>55</sup> ti<sup>55</sup> 弟弟，ma<sup>54</sup> 马，ŋa<sup>33</sup> tsɿ<sup>33</sup> 芽，miē<sup>33</sup> xua<sup>33</sup> 棉花，khuu<sup>33</sup> 裤子，kə<sup>33</sup> 高，sē<sup>55</sup> 深，lu<sup>33</sup> lu<sup>33</sup> 绿，tu<sup>35</sup> 渡（河），zu<sup>35</sup> 又，等等。从词类分布上看，汉语借词已渗入到词汇系统的各个词类，包括各类实词和虚词。在我们记录的 2644 个仙仁话词汇中，有 1404 个是汉语借词，占词汇总数的 53.1%。而且，汉语借词在今后还有大量增长的趋势。

在一些义类中，借词的比例非常高，如：宗教意识类占 89.2%，文化娱乐类占 88.1%，用品工具类占 72.6%。在实词中，除了名词大量吸收汉语借词外，数词受汉语影响也很大。仙仁乡土家人数数时，用本语词大多只能数到“六”，即 na<sup>54</sup> “一”、ŋe<sup>54</sup> “二”、so<sup>54</sup> “三”、zə<sup>54</sup> “四”、ō<sup>54</sup> “五”、wo<sup>33</sup> “六”。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会用本语词从“七”数至“十”，即 kə<sup>54</sup> “七”、xə<sup>35</sup> “八”、zə<sup>33</sup> “九”、ŋe<sup>33</sup> “十”。也有一些年纪大的人用两数相加表示，如：ō<sup>54</sup> na<sup>54</sup> “六”（5+1）、ō<sup>54</sup> ŋe<sup>54</sup> “七”（5+2）。但大多数人都已改用汉语借词。至于“十”以上的数，土家语全都借用汉语来表示。如：sɿ<sup>33</sup> zɿ<sup>33</sup> “十一”、sɿ<sup>33</sup> əɾ<sup>35</sup> “十二”。在数量结构中，当量词使用汉语借词时，数词大多也用借词。如：zə<sup>33</sup> əɾ<sup>35</sup> liā<sup>54</sup> “二两酒”，thō<sup>33</sup> təhē<sup>33</sup> wu<sup>54</sup> khue<sup>54</sup> “五块钱”。除